

杜传坤◎著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史论

杜传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杜传坤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5004-8061-7

I. ①中… II. ①杜…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①I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131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75

插 页 2

字 数 38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现状考察：基于儿童文学史观的问题	(1)
第一章 反思与重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12)
一 角度与方法：文化研究及建构论	(12)
二 价值尺度：历史与诗学	(23)
三 发生论辨正：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	(31)
第二章 草莱初辟中萌生：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发轫	(43)
一 域外来风：“儿童小说”之译介	(45)
二 小荷初露：“儿童诗歌”之创作	(66)
三 儿童的恩物：寓言和“童话”的编译	(79)
四 “潜文本”：周作人早期的童话儿歌研究	(93)
第三章 最美的童年时代：文化冲突中的童年想象	(104)
一 “开道之骅骝”：儿童文学本位论	(106)
二 《稻草人》：当“美丽童话”遭遇“现实人生”	(122)
三 《寄小读者》：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共同编制的浪漫童年	(148)
四 儿童诗歌：童心中流淌的天籁之音	(163)
五 儿童歌舞剧：爱与美的深情表演	(185)

第四章 回归现实：儿童文学的实践话语	(202)
一 儿童科学文艺：以科学常识应对现实危机	(204)
二 儿童小说：阶级生活的生动“教科书”	(224)
三 儿童诗歌：教育、革命与童心的合唱	(237)
四 政治教育童话：真世界中的真道理	(249)
第五章 终结抑或开端：民族共同体话语中的儿童身份	(266)
一 儿童戏剧：大时代的小战鼓	(267)
二 儿童小说：客观表象的政治性格	(288)
三 儿童诗歌：歌谣的革命叙事	(300)
四 社会寓言式童话：“奴隶的语言”与民族性格	(316)
余论 建构的限度与确定性的追求：一种可能的儿童文学史写作	(335)
参考文献	(346)
附录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事编年（1875—1949）	(352)
后 记	(407)

现状考察：基于儿童文学史观的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当成人文学领域响起“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时，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才刚刚开始，迄今为止也不超过十部史著。在近二十年的《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版）、《浙江师大学报》（儿童文学专辑）等几份重要学术报刊和几本《儿童文学论文选》及数本儿童文学概论、原理、教程等编著中，也仅有寥寥数篇关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文章。可见，与一个世纪以来成人文学数百部史著及数不胜数的研究文章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可谓“小小巫”了。而且，至今未见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口号，不知是对此问题重视不够，还是觉得在目前基础上谈“重写”有点底气不足。然而，这是个不应绕过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儿童文学之历史不仅直接关涉一个学科的存在与发展，还隐藏着所有儿童文学现实问题的背景缘起及可能性方案。基于对中国儿童文学史写作现状的考察与反思，本书意在寻求一种更具诱惑力的角度与方法，追索一种值得坚守的价值尺规，从其源头的现代性反思开始，尝试勾勒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另一种轮廓与影像。

暂不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是始于晚清、五四，还是“古已有之”，但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却只有极为短暂的历史。它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可以说，与成人文学或一般文学相比，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是非常落后的；而相对于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批评而言，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则是薄弱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研究的理论深度上。通常被视为开端性的代表作是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但这还属于某一历史阶段零星史料的“钩沉”而非“史”。8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现了几部填补空白的扛鼎之作，主要有：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张香还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1988）、张之伟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蒋风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蒋风、韩进著《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等。前三部是现代史，其后两部是当代史（此处的现代与当代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标示不同性质），最后一部是通史。此外涉及“史”的著作还有：分别由金燕玉和吴其南撰写的两部《中国童话史》（1992）、方卫平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孙建江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王泉根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2000）、朱自强著《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蒋风著《儿童文学史论》（2002，内收作者16篇独立的中外儿童文学史论文章，不是成体系的文学史）等。

既有的这些史著，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最值得肯定。许多都是第一手资料，有的是从尚健在的老一辈儿童文学工作者手中求索到，有的则在各图书馆资料室的故纸堆中穷搜抄录，有的历时几十年才得以成书，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这些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而且，这些史著基本都是填补空白之作，之前没有可以参照的摹本，从选材到方法到框架等都要自己摸索。作者通过对史料的钩沉、分类和分析，也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大致轮廓与基本特点。这些都是此课题进一步深入拓展与创新的基础，是不应绕过也绕不过的“基石”。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它们，可能会感觉某些观点略显“落后”、“保守”，甚至是陈旧和牵强，但是相对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有些观念其实是极具“先锋性”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62年的一本《中国儿童文学》，其中把胡风、周作人等的儿童

文学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的“毒草”来批判，两相对照就不难体会出这几部史作的历史性突破。但总的说来，这些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深掘，或者说，需要更深刻的“史识”和更有力的“史论”。鲁迅谈及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曾说，“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①。朱自清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一文中也指出，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都是史料的排列，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少的是“见”、是“识”，叙述纲领缺少“一以贯之”的史观。以往的几部中国儿童文学史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史料型”的儿童文学史。当然，对于文学史而言，它亦有其独特价值。

“史识”决定了文学史的图景，它是研究者在选择、阐释、评价文学现象时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对儿童文学史“一以贯之”的史识就是儿童文学史观，即儿童文学史“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儿童文学史是什么”首先需要面对“儿童文学是什么”，而“儿童文学是什么”则关联“儿童是什么”。较早的一部儿童文学史宣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一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儿童文学。以此种儿童文学观便可推演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是一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之历史。这一文学史叙述显然是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标准和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理论依据的。其他几部史虽然不同程度淡化了这种政治色彩，但大多仍未从根本上超越这一叙述模式。其局限具有一定的历史普遍性。

首先，这种儿童文学史观决定了对不同阶段儿童文学特质的认识，由此也决定了对材料——儿童文学现象的取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可以划分成三个分期。这三个分期里都充分体现出它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②。基于这种史观，在五四时期就关注怀着反帝反封建目的来翻译改写的作品，

① 鲁迅：《书信·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103页。

② 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绪论》，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

关注文研会“为人生”的儿童文学创作，而徐志摩的《吹胰子泡》、《香水》之类“有那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故事便遭到冷落；第二个十年间，则主要关注左翼儿童文学及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对米星如民间色彩的童话、凌叔华的儿童小说《小哥儿俩》等却不在意，甚至对儿童科学文艺也简略带过。这段文学史就变成了干净的“主流”文学史——“左联儿童文学史”。当然，任何一部儿童文学史都不可能穷尽历史上一切儿童文学现象，必须有所选择，关键在于选择的标准。上述纯粹的政治化标准，导致了一种过于简化、片面的儿童文学史图景。它无视历史中存在的大量游离于政治主流话语之外的文本，甚至剔除了曾经顺应潮流，但后来因文学自身以外的某种原因被冷落的文本。儿童文学成为图解政治话语的标本，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其文学性。本书也并非主张把原来的“非主流”甚至“逆流”与“主流”互换位置，以“边缘”替代“中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那同样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平等的，文学史不应单纯是其中一方的历史。本书认同王瑶先生的“典型文学现象”说，文学史不可能包罗一切文学现象，“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①。而且，这些典型现象所要体现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不单纯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特征”。

同时，这一儿童文学史观还使“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进步性”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文学史呈现为井然有序的“不断进步或进化的历史”图景，并由“思想的进步”推演出文学的艺术性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把思想性与艺术性等同起来。这是一种绝对的历史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它否定了儿童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其他可能性。因此，郭沫若的《一只手》等图解观念的革命作品受到过分推崇，并把某些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等归因于“世界观”的限制，这些缺陷会“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

^①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人，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得到弥补，从而使“他们后来的创作呈现出全新的面貌”^①。同样，叶圣陶因为在《皇帝的新衣》中直接描写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所以被断定比安徒生的原作“更进步了”。儿童文学由此被分成两类：“进步的”和“落后的”，而不是“美的”或“不美的”。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本位论”自然被判定为“片面”的——它“割裂”了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政治、教育的关系，除了强调儿童特点是其可取之处，显然与“反帝反封建”无多少直接关系，其影响“也必然是消极大于积极”的了。当抗战爆发，“长期以来影响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被彻底冲毁了，原来进步儿童文学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并加进新的内容”^②。儿童文学于是又“进步了”。

这种“预设”的文学史观，也影响了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常产生“牵强”与“附会”的解释。比如叶圣陶写于1921年的儿歌《拜菩萨》：

儿学拜菩萨，拉爹上坐作菩萨。他自己作种种姿势：上了烛，插了香，合十深深膜拜。

菩萨拜过了，他站起来，拔去了香，吹灭了烛，更举起小手掌说：“推倒你这个菩萨！”

对这个天真烂漫的儿童形象，文学史作者却这样分析道：“从‘儿’敢于推倒菩萨、反对偶像崇拜的举动中，可以体验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对当时儿童精神面貌的深刻影响。作者通过‘儿’拉爹当菩萨，先拜后推倒的游戏性行动来抒写儿童内心萌发的反封建思想，可谓匠心独具，构思巧妙，而又满蕴着炽烈的儿童情趣。”^③一个普通的儿童小游戏竟被赋予了如此重大的思想主题，这可能是儿歌作者难以预料的，诗中的儿童想必也根本没这个想法。

① 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绪论》，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③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再者，既然儿童文学被认为是“反帝反封建”这一国家政治或社会革命发展史的消极反应，文学史分期便无法摆脱政治化标准：大多数既有儿童文学史的分期几乎一致，起止时间基本为：1917—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9年（有的把解放战争的三年独立为一阶段）。唯一不同的是那部儿童文学通史，它以1923年为界，但依据却是当年《新青年》改刊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之前为五四，之后的二十七年被概括为“现实主义”、“革命儿童文学”等。冰心的《寄小读者》、丰子恺的儿童散文等分明具有五四“儿童本位”特点的作品却被驱逐出五四而“屈居”于此。如果以1923年之后儿童文学创作才开始“热闹”起来为由，将其分为两部分论述也许更合理一些。儿童文学史分期如果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划分的结果和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等的划分结果有时也恰好一致，但这也没什么关系。就像刘纳在其著作《嬗变》中所说，文学史界标与历史界标的大致重合有时也是出于对文学史事实的尊重。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变革、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几乎是亦步亦趋，这种事实可能导致儿童文学史界标与历史界标的基本一致。但这和自觉政治范式下的文学史分期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因为二者的儿童文学史观不同。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那么，“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①。也就是说，儿童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才应该是确定儿童文学史分期的依据，我们可以先探索出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而某一种规范体系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内相对被显示得最充分；同时，前一个时期规范系统的余脉和下一个时期规范系统的先兆也会存在其中，从而展现儿童文学史发展的连续性。据此，就可以划分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细小阶段，从而确定儿童文学史的分期。

另一个问题是儿童文学史叙述方式的静态与孤立。如王瑶先生所言，

^① [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文学史”作为一种“历史”，它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应该体现“过程”的观念与“联系”的观念^①。然而，这几部儿童文学史的体例大多是：每个时期的概况，然后理论、作家作品和报刊出版等几块，然后重要作家作品（或归于某种体裁之下）；分析这些文学作品时，先是作家生平人生经历等背景，然后介绍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最后简单评价其“思想先进性”，或者附带几句艺术特色，但基本上所有的“思想”与“特色”都大同小异。比如“革命儿童文学”的十年和抗战八年以及解放战争的三年，主题几乎都是爱国主义的“抗日”和揭露现实黑暗、抨击当局统治两种，题材也是这两种，而作家们所用的表现形式如童话的影射等都如出一辙。文学史却不厌其烦地一一罗列这些作家作品，重复介绍其内容与形式，读完之后给人一种“差不多”的感觉。这段文学史就好像是由同一个作家笔下的多篇类似内容类似风格的作品构成，史家的解读方式也是“差不多”。（作为文学史教材，这种“罗列”或许有其特别的价值。）在这种写法中，看不到作家作品自身的动态发展史，同一时期作家作品之间在比较中的艺术定位，以及同一作家作品在不同语境中的被接受情况；这一系列互不连接的文学现象之间似乎都是没有关系的，同时也是静止的，我们既看不到“过程”，也看不到“联系”。总之，没有“史”的感觉。

中国儿童文学史论著中对文本的阐释与评价方面尤其需要重视，这是一种文本“重读”，之所以意义重大，因为“‘再解读’既是对具体文本的再阐释，更重要的是文学史重构的组成部分。它是对文学史图景、描述方法等的一种试验”^②。既有的儿童文学史论著很多仍延续了多年前政治范式下的既有“定论”，并且多是对文本思想内容方面的泛泛而论和几点干巴巴、千篇一律的“艺术特色”；或者完全依据作家个人的“创作谈”，再填补些说不上错误但也无关紧要的认证材料；要么就是牵强附会的“过度阐

①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

释”，“六经注我”式的，让作品来注释带有时代烙印的既定观点与理论框架。此外，还存在以普通文学话语言说“儿童”之文学的“非儿童性”问题，其仅有的“儿童性”仅体现于对文本中对于最为常识性的所谓儿童“年龄特征”如浅显、生动、有趣等的简单笼统的“适应”性评价。缺乏从儿童文学之美学的层面对文本进行深入而独特的阐释。

既往儿童文学史对儿童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比较模糊。有的史著把历史上“写儿童的”、“童年视角”、“回忆童年”的，或者以今天儿童的标准来看能够理解的文本通通纳入儿童文学史的范围，具有把儿童文学概念泛化的倾向，这样的文学史显得“繁杂有余”而“纯”度不足。比如胡适的早期白话诗《两只蝴蝶》、《乌鸦》等，有史家就不作任何说明地将其称为代表性的“儿童诗”。但是，首先这诗应该不是有意为儿童写的——虽然有意与否并不能完全决定是否为儿童文学作品；其次，也不能因为它写了蝴蝶、乌鸦等“动物”就想当然地将其划归入儿童之文学——题材不能决定一切；此外，这种半文半白的“白话”在当时未必比浅近的文言更为儿童所理解——虽然对于今天的儿童来说是这样的。再如萧红的《呼兰河传》，鲁迅的《故乡》、《社戏》等，也不能因为使用了童年视角，写了童年生活，便不作任何界定和说明就作为儿童文学来论述。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童年回忆的文本很多，有诗歌也有散文小说，选择与论述时也应该有概念上的说明。五四时期还产生了一批“儿童崇拜型”文本，也不可不加辨析一股脑儿算儿童文学，因为“儿童崇拜”或“童心崇拜”本质上都是大人们的事，儿童自己意识不到这些也不会对此感兴趣。

此外，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这首先需要回答：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是不是儿童文学？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研究者关注过这一问题，在对儿童文学外延的框定中指出：其一，儿童文学是儿童自己发现或创作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其二，儿童文学是别人代替儿童发现或创作的文学——儿童化的文学。^①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

^① 赵伯青、徐迺迁：《儿童文学研究》，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页。

义的发现与区分，但通览中外儿童文学历史，通常的儿童文学定义大都是将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排除在外的，并且这个问题大多数时候没有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与言说范围。尽管对什么是儿童文学有各种各样的界定，但不管它们之间有多少不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认为儿童文学是“成人为儿童创作的”，而不包括儿童自己的创作。即使有论者注意到儿童自己也创作文本的事实，但也以各种理由将其拒之儿童文学门外。其观点大约基于这样的儿童假设：儿童的文学创作是偶然的、个别的、非自觉的，更重要的是普遍有失水准，因为其审美及创造美的能力是低下的。同时，它暗示了成人在这方面具有的绝对与至高权威。但这种假设只是假设而已，它可能就来自我们更早的假设：儿童被认为是缺乏审美及创造美的能力的，因此儿童也就被剥夺了成为相反条件的条件和机会，久而久之，这种“假设中的儿童”就变成了“现实中的儿童”，从而好像印证了我们当初的假设。这种假设的合理性值得质疑，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另一种可能：儿童未必是有失艺术水准的。儿童文学史对此可以有所作为：尽管历史上保留的此类文本并不多，但文学史只要接纳它们，这种姿态本身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五四前后的《少年杂志》与《儿童世界》等知名刊物都特意开辟专栏，刊载过儿童自己写的作品。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界一浪高过一浪的“低龄化写作”和“少年写作”，成人对此的困惑、尴尬、忧虑等，我们重新调整儿童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显得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既有儿童文学史论著的首要问题即儿童文学史观的问题，其后果主要体现在以政治话语取代或凌驾于文学话语之上的“非文学性”。儿童文学史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有很多问题与普通文学史是共在的，比如，儿童文学史同样要面对“历史观”、“文学观”的问题。就像文学史中的“文史之争”一样，儿童文学史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二者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前者追求一种真实性与可验证性，后者则强调文本的自足自立与阐释的个人主观性。但对于文学史而言，二者又缺一不可。一方面，文学史的写作力求揭示、还原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

其文本的选择、阐释与评价又必然基于某种文学观与文学史观，而任何一种史观皆基于某种“理论框架”，当代西方诸多学者皆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E. P. 汤普森的“框架”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在某种“框架”中，所谓的文学史“事实”才能获得意义^①。佛克马说，“历史事实就是能够依据某一理论概念而成为历史真实的那种东西”^②。海登·怀特的《后设历史学》则明确指出了“历史”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历史的写作具有“叙事”的性质，它是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经由这些结构我们得以重现过往事物，以达到解释它们的意义之目的。简言之，历史的存在必须赋予形式、引入意义。罗兰·巴特进一步将这种历史陈述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或者毋宁说是“想象力的产物”。（儿童）文学史作为一种“叙事”或“叙述”，或隐或显都会受到某种“隐蔽目的”的导引和牵制。此外，还因为这一历史的不在场，我们只能通过对历史先在的文本化、叙事化得到它。E. H. 卡尔的“历史哲学”认为，要想穷尽历史的文本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观念或历史哲学只能通过可获取的不完整的证据来形成，我们只能尽可能接近客观历史^③。因此，没有任何单一的叙述可以再现历史真相，不同的阐释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儿童文学史写作具有一种“叙事”性质，那么，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写作还是否存在“真实性”的问题呢？尽管“叙述历史学”一直在回避历史的叙述与所发生事件之间的关联，但“真实性”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历史的‘叙事性’，而否认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存在，认为‘文本’就是一切，‘话语’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现实是我们虚构、想象出来的。即使我们承认，‘历史’具有‘修辞’的性质，我们仍然有必要知道，‘哪些事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它们具有何种程度上的历史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1 页。

② [荷兰] 佛克马、蚊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5 页。

③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1 页。

确切性’”^①。历史中确有一系列的经典事件和历史事实，它们不是由文本构造出来的，不是只存在于文本之中，有些事实要求我们作出道义上的反应。所以，文学史的“叙事性”与文学史的“真实性”，是作为文学之历史的两极，皆不可或缺。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史写作中实现较好的融合，也是我们要努力去面对、解决的难题。

从新民主主义论这一政治视野和理论框架中，儿童文学呈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样态，这一“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能够“自治”的。我们之所以批评它的“非文学性”与“非儿童性”，批评它闭锁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褊狭，盖因我们是从另一种异质的价值参照立场进行审视之故。我们的立场就一定是绝对的、客观的、永恒正确的吗？当然不是。“当我们都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以后，留下的空白中应该放入什么？也许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放进去的，不过是另一套意识形态”^②。尽管我们不否认有一个真实的儿童的文学之“历史”，但我们只能从特定的视角看到它、阐释它、评价它。从此种意义上讲，任何儿童文学史论著皆不过是一种对于儿童文学历史的“建构”或“重构”。由此，所有的儿童文学史作之间可以是对话的、互文性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却总是遏制不住要从这相对性的“建构”中寻求一种“确定性”之历史的冲动。或许，这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宿命。只要我们时刻对此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保持一种反思与审慎的态度就足够了，而且大体也只能如此。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4 页。

^② [美]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3 页。

反思与重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如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首先需要超越狭隘的政治话语模式，充分尊重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文本的诗性特质。然而，纯粹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因为排斥了文本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显得精细有余而深度、厚度、广度不足，亦无助于对文学现象作全面、深入、合理的阐释。儿童文学史写作中的“纯文学”标准不但是不可取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如伊格尔顿所言，所谓“纯”文学理论，“纯粹”以“文学性”、“艺术性”作为标准的文学史，只不过是一种学术神话。因此，需要寻找更具整合性的儿童文学史话语模式。

一 角度与方法：文化研究及建构论

事实上，与成人文学相比较，儿童文学更难超脱于社会历史的文化规约。儿童文学主要是由成人社会提供给儿童的。成人对儿童的看法，对儿童文学本质及其功能的认识，都会极大地影响儿童文学的面貌特色，同时